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六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四年九月

明清間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估計

全 漢 昇

一四九二年，西班牙船隊由哥倫布率領，橫渡大西洋，發現美洲新大陸。其後西班牙人移植美洲，開發那裡的天然資源。由於祕魯、墨西哥銀礦的開採，自一五五〇至一八〇〇年，墨西哥及南美洲的銀礦約共出產世界銀產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約明朝(1368-1644)中葉前後，因普遍用銀作貨幣，銀求過于供，價值高昂，購買力越來越大。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自然把美洲白銀大量運往中國，以賺取厚利。

西班牙海外帝國自美洲擴展至菲律賓後，因為須以美洲作基地來統治菲島，自一五六至一八一五年，每年都以一至四艘（以二艘為多）大帆船，橫越太平洋，航行於墨西哥阿卡普魯哥(Acapulco)與菲律賓馬尼拉之間。自美洲對菲的出口貨，以白銀為主。這些白銀，自中國商人看來，購買力很大，故努力對菲輸出，把銀賺回中國。

法國學者索魯(Pierre Chaunu)認為，在新大陸發現後的長期間內，產額佔全球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美洲白銀，約有三分之一強，由美洲經太平洋運往菲律賓，及經大西洋運往歐洲，再轉運至亞洲，而其中大部分最後流入中國。鑑於西班牙大帆船大量白銀運往菲律賓、葡、荷及其他歐洲國家商人先後運銀東來，而中國對外貿易又長期出超，我們有理由接受他的判斷。

—

一四九二年，西班牙政府派遣哥倫布在大西洋航行，發現美洲新大陸。其後西班牙人紛紛移植美洲，開發那裡豐富的天然資源。由於祕魯、墨西哥銀礦的開採，十六世紀美洲白銀產額約佔世界總額四分之三，十七世紀約佔百分之八四・四，及十八世紀更多到佔百分之八九・五。¹ 自一五五〇至一八〇〇年，墨西哥

¹ Harry E. Cross, "South American Bullion Production and Export 1550-1750," in J. 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N.C., 1983, p.403.

及南美洲的銀礦，約共出產全球白銀總產額百分之八十以上。²

當十六、七世紀間，祕魯南部的波多西（Potosi，今屬Bolivia）銀礦，每年產銀多至佔世界銀產額百分之六十以上，銀被人看成像街上的石頭那樣低賤的時候，³ 明朝（1368-1644）中葉前後的中國，銀卻因被普遍用作貨幣，求過于供，價值特別高昂，被人視為至寶。明代中國流通的貨幣，本來以“大明寶鈔”為主。寶鈔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開始發行，初時價值穩定，流通狀況良好。可是後來發行額激增，寶鈔價值低跌，大家為著保護自己利益起見，市場交易，都爭著用銀而不用鈔。另一方面，中國銀礦蘊藏並不豐富，銀產有限，供不應求，結果銀的價值或購買力越來越增大。同樣數額的銀子，在中國的購買力，既然遠較在美洲為大，從事國際貿易的中外商人，自然把美洲白銀大量運往中國，以獲取厚利。

自明季至清中葉，或自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長期間內，由於銀價高下的懸殊，美洲盛產的白銀，到底總共有多少流入中國？對於這個問題，因為文獻有闕，我們不能得到準確的數字來加以解答；本文現在只能把各有關記載加以整理比較，作一近似的估計。

二

由於西班牙人在祕魯、墨西哥等地投資開採銀礦，西屬美洲于一五四〇至一七〇〇年至少產銀四萬噸，可能多至六、七萬噸。⁴ 自十六世紀中葉至殖民時期終了前夕（1810），美洲約共產銀十萬噸，或三十億至三十五億盎斯。⁵ 美產

2 Harry E. Cross, 前引文, in J. F. Richards, 前引書, p. 397.

3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以下簡稱Phil. Isl., 55 vols., Cleveland, 1903-09), Vol.27, p.153; 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九期（香港九龍，1967），頁一七，又見于拙著《中國經濟史研究》（新亞研究所，1976）中冊，頁二二五。

4 Harry E., Cross, 前引文, in J. F. Richards, 前引書, p.404.

5 Richard L. Garner, “Long-Term Silver Mining Trends in Spanish Americ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eru and Mexico,”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4, October 1988, p. 898.

白銀的大部分，每年都一船一船的運往西班牙，再通過貿易關係轉運歐洲各地。

除經大西洋運往歐洲外，美洲出產的白銀又經太平洋運往菲律賓，再轉運往中國。西班牙海外帝國自美洲擴展至菲律賓後，因為須以美洲作基地來從事對菲島的統治與殖民，自一五六五至一八一五年，每年都派遣一艘至四艘（以兩艘為多）載重由三百噸至一千噸（有時重至二千噸）的大帆船（Galleon），橫越太平洋，航行于墨西哥阿卡普魯可（Acapulco）與菲律賓馬尼拉（Manila）之間。當日航海技術遠不如現代進步，大帆船在廣闊的太平洋上航行，自然遭遇許多風險和困難，從而運費特別昂貴。在美洲對菲輸出的各種物產中，白銀因為本身價值較大，體積、重量較小，能夠負擔得起昂貴的運費，自然成為美洲最重要的輸出品。

位於大帆船航線西端的菲律賓，在十六、七世紀間，因為土人文化水準低下，經濟落後，既不能滿足在菲西班牙人生活上的需要，也沒有什麼重要物產，用來大量輸往美洲。幸而鄰近菲島的中國大陸，資源豐富，生產技術進步，有能力大量輸出各種物產，來供應菲島西人日常生活的消費，此外又對菲輸出生絲、絲綢等貨物，由西人轉運往美洲出售獲利，同時大帆船也可因此而獲得運費收入，在太平洋上來回航運，長達二百五十年之久。

菲島西班牙人自美洲運來的鉅額白銀，從生活在銀價高昂地區的中國商人看來，是非常強大的購買力，故努力擴展對菲出口貿易，把銀賺回中國，獲取厚利。可是，另一方面，美洲白銀的源源流入菲島，卻影響到西班牙輸入美銀的減少，對西班牙經濟諸多不利。因此，西班牙政府對於美銀的大量輸往菲島，曾經加以限制。在一五九三年正月十一日，及一五九五年七月五日和九日，西班牙國王都先後發佈敕令，規定每年自墨西哥運菲的白銀，以五十萬西元（peso）為限。⁶

6 Alonso Fernandez de Castro, "Principal Points in Regard to the Trade of the Filipinas" (undated, 1602?), in *Phil. Isls.*, Vol. 12, pp. 44-47; Hernando de Los Rios Coronel, "Memorical and Relation of the Filipinas" (Madrid, 1621), in *Phil. Isls.*, Vol. 19, pp. 239-240; 拙著，〈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以下簡稱《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卷第一期（香港九龍，1969），又見于拙著《中國經濟史論叢》（新亞研究所，1972），第一冊，頁四三九。按“西元”即西班牙銀元，其購買力在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初期，約為二十世紀

可是，因為把美洲白銀運菲購買中國絲貨，再運往美洲出賣，獲利甚大，西國王這種規定限額的敕令，事實上並沒有切實執行；因為利之所在，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白銀走私，非常猖獗。在一五九七年，由墨西哥運往菲島的白銀，包括合法的及非法走私的在內，據說多至一千二百萬西元（約 307,000 公斤，或 345,000 公斤），超過西班牙船隊自美洲運回本國的白銀與貨物的總值，⁷ 比明代中國半個世紀出產的白銀還要多。⁸ 這個遠超過西班牙國王敕令規定限額的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以致被人懷疑；⁹ 但根據一六〇二年墨西哥城（Mexico City）市議會的估計，每年由墨西哥運往菲律賓，再轉運往中國的銀子，仍然多至五百萬西元（約 128,000 公斤，或 143,750 公斤），約為西王敕令規定限額的十倍。¹⁰

初期的十倍；在十八世紀中葉，約為二十世紀初期的五倍。參考上引拙著〈明代的銀課與銀產額〉，註二五。

7 Woodrow Borah, *Early Colonial Trade and Navigation between Mexico and Peru*, Berkeley, 1954, p. 123; J. H. Parry, "Transport and Trade Routes" in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09-210; C. R. Boxer, "Plata es Sangre: Sidelights on the Drain of Spanish-American Silver in the Far East, 1550-1700," in *Philippine Studies*, Manila, July 1970, Vol. 18, p. 464; William S. Atwell, "Notes on Silver, Foreign Trade, and the Late Ming Economy," (以下簡稱 "Notes on Silver"), in *Ch'ing-shih wen-t'i*, Vol. III, no. 8, December 1977, p. 2; William S. Atwell, "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 in *Past and Present: 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no. 95, May 1982, p. 74; John J. TePaske, "New World Silver. Castile and the Philippines 1590-1800," in J. F. Richards, 前引書, p. 436; Lyle N. McAlister, *Spain and Portugal in the New World, 1492-1700*, Minneapolis, 1984, p. 375. 按 John T. TePaske 把一千二百萬西元折算為銀 307,000 公斤，而 William S. Atwell 則折算為 345,000 公斤，這是因為前者把西元所含的純銀 (pure silver) 來折算，而後者則按西元本身的重量來折算的原故。

8 Frederic E. Wakeman, Jr.,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7, no. 1, June 1986, pp. 2-3; James Peter Geiss, "Peking under the Ming (1368-1644)," Ph. D. thesis, Princeton, 1979, pp. 157-158.

9 Brian Moloughney and Xia Weizhong, "Silver and the Fall of the Ming: A Reassessment," i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ptember 1989, no. 40, p. 62. 按此文的中譯文，見倪來恩，夏維中〈外國白銀與明帝國的崩潰——關於明末外國白銀的輸入及其作用的重新檢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大學，一九九〇年第三期，頁四六—五六。又參考 O. H. K. Spate, *The Spanish Lake*, Canberra, 1979, p. 201.

10 參考註 4。

一九八六年，英國劍橋大學索札（George Bryan Souza）博士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對西班牙大帆船自美洲運銀往菲島的數額，細加研究。他估計自一五九〇至一六〇二年，大帆船自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運往菲律賓的白銀，共約六千七百萬西元（2,010,000公斤），自一六〇二至一六三六年，共約八千萬西元（2,400,000公斤）；自一六三六至一六四四年，共約七百萬西元（210,000公斤）。把以上三個數目加在一起，自一五九〇至一六四四年，菲島約共輸入美洲白銀一億五千四百萬西元（4,620,000公斤，或4,620公噸）。¹¹

到了一九八七年六月，美國加州太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經濟學系符臨（Dennis O. Flynn）教授，在日本東京慶應大學舉辦的貴金屬歷史研討會中，宣讀一篇論文，也對十七世紀大帆船自美運菲銀數，加以估計。他說在十七世紀初期，每年自美運菲的銀子，包括官方登記及走私瞞稅的銀子在內，每年共約一百二十八公噸；由此推算，在十七世紀，自美洲運往菲島的銀子，可能多至一萬三千公噸，或一千三百萬公斤。¹² 他這個估計數字，可能有些誇大。

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的長期間內，每年自美洲運抵菲島的白銀，由於中國對菲貿易的鉅額出超，絕大部分都流入中國。在十六、七世紀之交的數十年內，馬尼拉海關向中國貨物課徵的入口稅，每年在入口稅總額中都佔很高的百分比，有時更高至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由此可以推知，在馬尼拉每年輸入外國貨物總值中，中國貨物所佔的百分比，一定非常之大。不特如此，輸入菲島的中國貨物，並不都要繳納關稅，例如糧食（甚至各種食物）、軍需品等，自一五八九年起都免稅輸入。而這些貨物，既然和菲島多數人日常生活及軍事上的防衛有密切關係，其輸入量可能非常之大。如果把這許多免稅入口貨物包括在內，中國貨物在馬尼拉入口總值中自然要佔更高的百分比，從而菲島對華貿易的鉅額入超，自然要影響

11 George Bryan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4-85.

12 Dennis O. Flynn, "Comparing the Tokugawa Shogunate with Hapsburg Spain: Two Silver-Based Empires," preliminary draft prepared for the Keio Conference on Precious Metals, June 1987.

到大量白銀流入中國。¹³

關於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估計，法國歷史學者布勞岱（Fernand Braudel）在他的著作中，曾經引用兩位法國學者的研究。其中一位為杰納特（J. Gernet），他認為在一五二七至一八二一年間，自美洲銀礦採煉得來的白銀，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國。另外一位法國學者索魯（Pierre Chaunu），認為這個估計過高，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強，由美洲經太平洋運往菲島，及經大西洋運往歐洲，再轉運往亞洲，而其中的大部分最後都流入中國。¹⁴ 索魯這個估計，顯然比較接近事實。

三

西屬美洲出口的白銀，一方面橫渡太平洋，經菲律賓流入中國；他方面經大西洋運往西班牙，再由歐洲運往亞洲，其中有許多最後流入中國。

西班牙人在美洲投資採礦得到的銀子，一部分作為政府稅收，一部分通過貿易關係，每年都一船一船的運回本國。根據官方的登記，由一五〇三至一六六〇年，西班牙共自美洲輸入白銀 16,886,815 公斤，或 16,886 (十) 公噸，每年平均輸入一百公噸多點。¹⁵ 但事實上，美洲白銀走私出口，數額很大。把官方登記數字及走私估計數字加在一起，阿特曼（Artur Attman）教授判斷，在十七世紀，每年由美洲運往歐洲的白銀，約為 308 噸至 325 噸。¹⁶ 美洲于一五四〇至一七〇〇年，

13 Souza, 前引書, p. 82; 拙著〈明季中國與菲律賓間的貿易〉，《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卷，第三表，又見於拙著《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一冊，頁四三一一四三二。

14 Fernand Braudel, *The Wheels of Commerc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New York, 1982, Vol. II, p. 198;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c des Ibériques (X VI^e, X VII^e, X VIII^e Siècles)*, Paris, 1960, pp.268-269; Frederic E. Wakeman, Jr, 前引文, in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7, no. 1, pp. 2-3; Brian Moloughney and Xia Weizhong, 前引文, in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40, p.52.

15 Earl J. Hamilton,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1501-1650*, Cambridge, Mass., 1934, p.42.

16 Artur Attman, *American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orld Trade, 1600-1800*, Goteborg, 1980, p. 78; Dennis O. Flynn, 前引文。

至少產銀四萬噸，可能多至六、七萬噸，其中約百分之八十運往歐洲。¹⁷

由于美洲白銀的大量輸入，西班牙國內流通的銀幣因數額激增而價值下跌，物價上漲，在十七世紀頭十年約為十六世紀頭十年的三、四倍，¹⁸ 物價水準遠較歐洲其他國家為高。¹⁹ 看見西班牙物價那麼昂貴，歐洲其他國家的商人，都乘機把貨物運西出售獲利，結果西班牙對外貿易長期入超，白銀大量流出國外。²⁰

葡萄牙和西班牙距離最近，後者因貿易逆差而輸出的銀子，自然有不少流入葡國。除一般貨物外，葡人又由於胡椒貿易與奴隸貿易的經營，賺到鉅額白銀。新航路發現後，航行於歐、亞間的葡船，自印度運載價值大、獲利多的胡椒回國，²¹ 然後分別銷售於歐洲各地。早在十六世紀初期，葡人已經控制歐洲許多國家（包括西班牙在內）的胡椒市場，²² 故自貿易利潤中賺到許多銀子。復次，當探尋新航路的時候，葡人沿著非洲西岸探險，在那裡擁有根據地來收購奴隸，轉售與西班牙來獲利。另一方面，美洲本土的印第安人，自舊大陸各種傳染病菌傳播到那裡以後，缺乏抵抗能力，死亡人數甚多。由於勞動力供應的不足，為著要開發美洲天然資源，西班牙人須長期向葡人購買大批黑奴，故他們持有的銀子，有不少為葡人賺取了去。²³

葡人自西班牙人那裡賺取的美洲白銀，並不長期停留在國內，而沿著新航路運到東方來。葡人經營歐、亞間貿易，發現由歐洲前往中國，銀越往東方去，購買力越大。由於歐、亞間銀價高下懸殊，葡國商人開船前往印度，多半載運鉅額

17 Harry E. Cross, 前引文, in J. F. Richards, 前引書, p.404.

18 Earl J. Hamilton, 前引書, p. 207.

19 J. H. 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Penguin Books, reprinted 1975), pp. 195-196.

20 拙著〈三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以下簡稱《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民國七十八年，頁八五一八六。

21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1969, p. 52.

22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London, 1976, Vol. I, p. 544.

23 拙著〈三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頁八六一八七。

白銀出口。這些白銀運抵印度西岸果亞（*Goa*）後，大部分都轉運往澳門去。曾經于一五八五至一五九一年在東印度遊歷的一位英國人，說葡人每年約運銀二十萬葡元（*crusadoes*，約 6,000 至 7,000 公斤）往澳門。²⁴ 他報導的這個數字可能偏低，因為近年有人根據有關資料計算出，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葡人每年運往遠東的銀子，多至一百萬篤卡（*ducat*，過去歐洲許多國家通用的貨幣），或約 32,000 公斤。²⁵

關於萬曆（1573-1620）中葉左右，葡船由印度果亞附近運銀至澳門，再轉運至廣州購買貨物的情況，王臨亨《粵劍編》（《筆記續編》本，廣文書局）卷三，頁一九下至二〇說：“西洋古里【*Calicut*，在印度西岸果亞之南】，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三四月間入中國市裸物，轉市日本諸國以覓利，滿載皆阿堵物也。余駐省【廣州】時，見有三船至，舟各齎白金三十萬。投稅司納稅，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又說：“西洋之人往來中國者，向以香山澳中爲艤舟之所，入市畢則驅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漸蟻聚蜂結，巢穴澳中矣。當事者利其入市，……姑從其便。……夷人金錢甚夥，一往而利數十倍。……”²⁶ 文中說“白金三十萬”，意指銀三十萬兩，也泛指三十萬葡元，或三十萬篤卡。²⁷ 由此可見，這三艘葡船約于十七世紀初運往澳門、廣州購買貨物的銀子，和上述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葡船每年運往遠東貿易的銀數，差不了多少。又據阿特韋爾（William S. Atwell）教授的研究，一六〇一年，有三艘葡船由印度啓航往中國，其中一艘在

24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Oxford, 1968, p. 6; C. R. Boxer, 前引文, in *Philippine Studies*, Vol. 18, no. 3, pp. 435-460; William S. Atwell, “Notes on Silver,” in *Ch'ing-shih wen-ti*, Vol. III, no. 8, p. 3; Bal Krishna, *Commeric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 (1601 to 1757)*, London, 1924, pp. 44-45.

25 Geoffrey Parker,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nance in Europe, 1500-1730,” in Carlo M. Cipolla, ed.,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Glasgow, 1974, p. 528.

26 王臨亨于萬曆二十九年（1601）在廣州閩獄辦理案件，他的《粵劍編》當撰於此時或稍後（見該書敘）。

27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n, 1963, p.336.

廣東海岸附近失事，船上載有香料及約值三十萬葡元的銀幣，或約銀九千至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公斤。²⁸ 此外，根據索札博士著作的記載，可知在一六二一年之前，有一艘葡船載運約值三十萬兩的銀子，在自印度向澳門航行途中，為海盜所劫掠。²⁹ 有人估計，直至一六三九年，葡人經印度果亞及馬尼拉運往澳門的銀子，多至五十萬公斤。³⁰

由此可見，原來由美洲運返西班牙的白銀，有不少為葡人賺取了去，由葡船載運往果亞，再運往澳門、廣州，採購中國貨物，轉運往歐、亞各地出售獲利。可是，到了十七世紀，由於荷蘭海上勢力的崛起，葡人不復能獨佔自歐洲到東方來的新航道。位於印度洋、太平洋間交通要衝的滿刺加，在葡人佔據一百三十年後，于一六四一年為荷人攻佔。此後航經馬六甲海峽的葡船，便常受騷擾，澳門、果亞間的貿易跟著衰落，從而葡船自本國運往果亞的銀子，便不能順利運往中國了。

四

當葡人因果亞、澳門間航路受阻，而不能自歐順利運銀來華的時候，西班牙自美洲輸入的銀子，又由荷人轉運到東方來。早在一五九五年，荷蘭航海家已經打破葡人對好望角航線的壟斷，率領船舶四艘東來，次年抵達爪哇下港（一作萬丹，Bantam）。到了一六〇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在下港設立商館，其後更在爪哇巴達維亞（Batavia）建立貿易基地，經營歐、亞間廣大地區的貿易。

荷蘭水道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和西班牙貿易，經常保持鉅額出超的紀錄，把西班牙自美洲輸入的白銀，大量賺回本國。十七世紀中葉前後，由於荷對西貿易出超，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運銀船隊（silver fleet），每年都有三十至五十艘船隻，駛往西班牙港口，把銀運走。³¹ 每年荷船運走的銀子，約佔西

28 William S. Atwell, 前引文, in *Ch'ing-shih wen-t'i*, Vol. III, no. 8, p. 3.

29 George Bryan Souza, 前引書, p. 196.

30 Brian Moloughney, and Xia Weizhong, 前引文, in 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 no. 40, p.59.

31 Kristof Glamann,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rade," in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60.

船自美洲運回總額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有些估計更高至佔百分之五十。³²

荷人在歐、亞間往來貿易，看見銀在東方的購買力，遠較在歐洲為大，便大量輸出白銀，使銀在對東印度的出口貿易總值中，佔有很大的比重。一六〇三年，荷向東印度輸出的白銀，其價值為輸出貨物的五倍；及一六一五年，更多至為輸出貨物的十五倍。³³ 由一七〇〇至一七五〇年，荷向東印度輸出貨物價值，約佔輸出總值三分之一少點，輸出貴金屬（以銀為主）則佔三分之二有多。³⁴ 有人估計，自一五七〇至一七八〇年，西班牙大帆船自美洲運銀至菲律賓，共約400百萬盾；約在同一時期，由荷蘭運往亞州的金、銀（以銀為多），多至590百萬盾以上。³⁵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運往亞洲的金、銀，共值125百萬盾；及十八世紀，激增至448百萬盾。³⁶

荷人以巴達維亞為基地來經營東至日本、西抵波斯灣的廣大地區的貿易，他們自歐洲東運的銀子，分別用來在亞洲各地採購貨物，並不以在中國為限。但明、清間中國銀價高昂，物產豐富，視銀如至寶的中國商人，看見荷人帶來那麼多銀子，購買力很大，自然努力拓展對荷輸出貿易，把銀賺取回國。在一六二五年，

32 同上；Violet Barbour, *Capitalism in Amsterdam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50, p. 51；C. R. Boxer, 前引文, in *Philippine Studies*, Vol. 18, no. 3, pp. 469-470.

33 M. A. P. Meilink-Roe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1969, p. 378.

34 Ivo Schöffer and F. S. Gaastra, "The Import of Bullion and Coin into Asia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Maurice Aymard, ed., *Dutch Capitalism and World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22-223.

35 同上, p. 230. 按在十七世紀六十年代，每兩銀等于3.5盾；到了八十年代，等于4.125盾。（見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1974, p. 27.）到了十八世紀，在一七二九年，每兩銀等于3.64盾；一七三一年，3.57盾；一七三二年，3.64盾；一七三三年，3.55盾。（見C. J. A. Jö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1982, p. 325.）

36 F. S.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Its Intra-Asiatic Trade in Precious Metals," in Wolfram Fischer, R. Marvin McInnis and Jügen Schneider, eds., *The Emergence of a World Economy 1500-1914: Papers of the I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nomic History*, Wiesbaden, 1986, p. 99.

駛抵巴達維亞的中國商船，其噸位有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回航本國的船隊那麼大，或甚至更大。在一六四四年，航抵巴達維亞的八艘華船，共輸入中國貨物三千二百噸，但它們自那裡運返中國的貨物，每年不過八百至一千二百噸。³⁷ 由於貿易順差，中國商船離巴達維亞返國，經常運走鉅額白銀。因為華船繼續把銀運走，到了一六五二年八月，巴達維亞市場上深以交易籌碼不足為苦，政府被迫准許使用已被剝奪貨幣資格的錢幣來交易。³⁸

中國對荷輸出的貨物，種類甚多，而以生絲、瓷器及茶葉為最重要。荷蘭東印度公司自創辦時開始，即把生絲與胡椒及其它香料並列為最能獲利的商品來經營。³⁹ 在荷蘭市場上，中國生絲要和波斯生絲競爭，但在一六二四年二月廿七日阿姆斯特丹生絲價目單上，因為品質較優，中國產品被評價較高。⁴⁰ 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荷人自波斯運生絲赴阿姆斯特丹出售，利潤為投資的百分之一百，中國生絲的利潤則高至為百分之一百五十。⁴¹

除生絲外，東來貿易的荷人又為中國瓷器在歐洲開闢廣大的市場。自一六〇二至一六八二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入歐洲的瓷器，共達一千二百萬件；如加上運往亞洲各地出賣的瓷器數百萬件，則在這八十年間，中國通過該公司輸出的瓷器，超過一千六百萬件。⁴² 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營中國瓷器出口貿易，主要以台灣、巴達維亞為轉接基地。自一七二九年開始，該公司開闢荷蘭、廣州航線，在

37 Leonard Blussé, "Chinese Trade to Batavia during the Days of the V. O. C.," in 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he Malay World*, Paris, 1979, *Archipel* 18, pp. 195, 205.

38 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The Hague, 1958, pp. 54, 56-57.

39 同書，p.112; Niels Steensgaar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ast India Compan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aravan Trade*, Chicago, 1973, p. 158.

40 Kristof Glamann, 前引書，p. 113；陳小沖〈十七世紀上半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擴張〉，《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41 M. A. P. Meilink-Roelofsz, 前引書，p. 263.

42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1954, pp. 48, 227-228; 林仁川〈試論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的商品結構與利潤〉，《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陳萬里〈宋末清初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瓷器〉，《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一期，頁二二。

廣州瓷器市場上成為最大主顧之一，⁴³ 中國瓷器出口貿易遂呈現出一個新局面。荷船自廣州直接航行返國，由一七三〇年至一七八九年，共自廣州輸出中國瓷器四千二百五十萬件，每年平均七十二萬件，將近為十七世紀的五倍。⁴⁴

除絲、瓷外，近代中國茶葉對歐輸出貿易，在歐洲各國商人中，首先由荷人經營。早在一六一〇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已經運茶往歐洲出賣，比英國東印度公司于一六六九年纔第一次運茶赴英，要早半個多世紀。荷人壟斷華茶對歐輸出貿易，約于一六三五年轉運往法國出售，于一六四五年運銷于英國，于一六五〇年運銷于德國及北歐各地。⁴⁵ 在一七二九年荷蘭輸入華貨總值中，茶佔百分之八五·一，一七六〇年佔百分之八九·六，直至一七九三年每年多半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成為輸荷華貨價值最大的商品。⁴⁶ 自一七三九年開始，華茶已經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自東方運回歐洲的價值最大的商品。⁴⁷ 到了一七四〇年，該公司自東方輸入貨物總值中，華茶和咖啡約佔四分之一。⁴⁸

在十七、八世紀中、荷貿易中，中國既然因絲、瓷、茶及其它貨物的輸出而貿易出超，上述荷人自歐洲運到東方來的銀子，自然有不少輸入中國。在乾隆六年（1741）左右，在籍侍郎蔡新估計，由於中國貨物對荷大量輸出，“閩、廣兩省所用者皆番錢，統計兩省歲入內地約近千萬【兩？】”，⁴⁹ 數目可能有些誇大；但我們不能否認，當日中國因為對荷貿易出超，每年有鉅額白銀輸入中國這一事實。

43 C. J. A. Jörg, 前引書, p. 194.

44 C. J. A. Jörg, 前引書, p. 149. 據同書, p. 359, 荷蘭東印度公司由一七三〇至一七八九年，共售出瓷器 42,689,898 件。

45 T. Volker, 前引書, pp. 48-49; G. B. Masefield, “Crop and Livestock,” in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前引書, Vol. IV. pp. 297-298. 又 Walter Minchinton, “Patterns and Structure of Demand 1500-1750,” in Carlo M. Cipolla, ed., 前引書, p. 126, 說荷蘭東印度公司于一六〇九年第一次自中國運茶往歐洲。

46 C. J. A. Jörg, 前引書, p. 217-220.

47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p. 177.

48 Kristof Glamann, “European Trade 1500-1750,” in Carlo M. Cipolla, 前引書, p. 447.

49 《漳州府志》（台南市，民國五十四年影印本）卷三三，人物六，頁六四一六五，〈蔡新傳〉；蔡新《緝齋文集》（原書未見，茲引自許濂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

五

上述法國學者索魯認為，在新大陸發現後的長期間內，產額佔世界總額百分之八十有多的美洲白銀，約有三分之一強，由美洲經太平洋運往菲律賓，及經大西洋運往歐洲，再轉運至亞洲，而其中的大部分最後流入中國。鑑于西班牙大帆船大量運銀往菲律賓，葡、荷及其他歐洲國家商人先後運銀東來，而中國對外貿易又長期鉅額出超，我們有理由接受他這個判斷。

除美洲白銀外，因為日本在十六、七世紀之交銀產豐富，葡、荷商人又自日本輸出白銀來應付國際貿易上的需要。自十七世紀初期開始，葡人在亞洲各地貿易，需銀甚多，他們由歐洲運來的銀子，約只能滿足所需數額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主要來自日本。⁵⁰ 自一六三九至一六六八年，荷人在亞洲貿易所需的銀子，約有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來自歐洲，其餘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則來自日本。⁵¹ 這些經由葡、荷商船及其它途徑自日本輸出的白銀，由於中國對外貿易出超，也有不少輸入中國。

(本文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北京，一九八五年，頁四〇七），卷四；田汝康〈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帆船在東南亞洲航運和商業上的地位〉，《歷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八期。又《清朝文獻通攷》（修于乾隆末年）卷一六乾隆十年（1745）項下說：“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閩、粵之人稱為番銀，或稱花邊銀。凡荷蘭、佛郎機〔葡萄牙〕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圓計。……而諸番向化，市舶流通，內地之民咸資其利，則實緣我朝海疆清晏所致云。”

- 50 Seiichi Iwao, “Japanese Gold and Silver in the Worl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Tokyo: Japanes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1959, p. 64.
- 51 Kristof Glamann, *Bullion Flows and World Trade in the Sixteenth-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Denmark Lectures o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29 April 1981,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4) ; 同上作者，“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rade,” in E. E. Rich and C. H. Wilson, eds., 前引書, Vol. V. p. 258.

Estimate of Silver Imports into China from the Americas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Ch'üan Han-sheng

In 1492, Spanish frigates under the command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crossed the Atlantic Ocean and discovered the new continent of America. Soon thereafter, Spaniards emigrated to the Americas and began to exploit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ey found there. From 1550 to 1800, silver extracted from Peruvian and Mexican mine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roduction of silver.

In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Ocean,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on, silver was commonly used as currency. As the demand for silver exceeded supply and its price rose, its purchasing power became increasingly greater. Merchant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naturally began to import silver in large quantities into China in order to profit from it.

After the Spanish overseas empire expanded to the Philippines, the Americas became the base from which the Philippines were ruled. Therefore, from 1565 to 1815, every year one to four large ships (usually two) made the Atlantic crossing from Acapulco to Manila. The main American export to the Philippines was silver. Because Chinese merchants greatly valued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silver, they went to considerable lengths to export products in exchange for it.

The French scholar Pierre Chaunu has estimated that long after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continent, American silver production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he world's output.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is silver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Americas to the Philippines; the remainder was transported across the Atlantic to Europe, and from there on to Asia.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most of this silver was China. Large quantities of silver were exported from Mexico to the Philippines by Spanish ships, and brought to China by Portuguese, Dutch and other traders, leading to a long-term favorable balance of foreign trade for China. There are, therefore, sound reasons to accept Chaunu's estimate.